



环境政治学论丛



环境政治 国际比较

郇庆治 著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山东大学出版社

环境政治学论丛

环境政治国际比较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郇庆治 著

Huan Qingzhi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政治国际比较/郇庆治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607-3382-1

I. 环…

II. 郇…

III. 生态环境—政治学—对比研究

IV. D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52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64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山东山大图书有限公司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郇庆治,男,汉族,1965年10月生,山东青州市人,法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专长为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政党政治。已出版专著有《当代欧洲政党政治》《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欧洲绿党研究》《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等多部,并在《环境政治学》《欧洲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文史哲》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基于比较政治学方法探讨当代国际环境政治中观念创新和制度性回应实例的环境政治学专著。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十四章，分别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广泛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比如可持续发展、环境安全、生态现代化与环境公民权，以及环境运动与环境全球管治和欧美绿党政治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作者希望，这种对主要是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解读，能够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Supported by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Program for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

联邦德国洪堡研究基金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资助

Acknowledgments

Varied versions of the 14 chapters in this book have been, or will soon be, published as journal articles. These articles can be found in: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Beijing) (6/2001:84-92; 6/2002:75-84; 4/2004:105-117; 6/2005:67-80; 6/2006:80-103),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Beijing) (2/2004:17-22), *Environmental Politics* (London) (4/2006:650-655); *Fudan Review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hanghai) (2007, forthcoming), *Issues on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Jinan) (2/2004:45-52; 3/2005:73-83), *MZES Working Paper* (Mannheim) 96 (2006), *Marxism and the Reality* (Beijing) (2/2006:90-98),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Jinan) (3/1998:110-116; 6/2000:115-120; 6/2003:115-120; 1/2007:157-163). I thank the editors of these journals and a number of anonymous referees who read earlier drafts of the chapters in the form of journal submissions and provided invaluable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They deserve some of the credit for whatever qua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current book. I also acknowledge the author reuse policy of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and thank them for permission to use these articles here in the revised form.

As with any endeavour that has gestated as long as this one ha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deserve acknowledge of appreciation. Of them are John Barry, Arnold Cassola, Jan van Deth, Andrew Dobson, Brian Doherty, Per Gahrton, Peter Hall, Simon Hix, David King, Beate Kohler-Koch, Wolfgang C. Müller, Ferdinand Müller-Rommel, David Pepper, Thomas Poguntke, Donatella della Porta, Chris Rootes, Dieter Rucht, Wolfgang Rüdig, Hermann Schmitt and Weiming Tu. Many thanks must also go to the following scholarships, programmes and research funds which made my studies as well as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possible. They includ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Research Fellowship(2005/2006 at Mannheim Universi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Visiting Scholar Program (2002/2003 at Harvard University), DAAD-K. C. Wong Foundation Research Fellowship(2002 at Düsseldorf University), The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1998/1999 at Lüneburg University), and the Program for New Century Excellent Talents i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inistry(2005-2008, NCET), Fok Yingtung Education Foundation's Young Teachers Fund(2002-2004), and the Excellent Young Teachers Program of Education Ministry(2001-2004, EYTP).

In addi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y gratitude to my host universities, Lüneburg University, Düsseldorf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annheim University, and my home university,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former offered me so convenient facilities and excellent service for my study there, while the latter permitted me spending so lot academic vacations abroad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my stay at Mannheim during which I can revise and compile this book.

Finally but preeminently,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my family and my parents, whose steadfast support, forbearance and self-sacrifice make all the things possible.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em.

Qingzhi Huan

Mannheim, 4 September 2006

导 言

在 21 世纪初的过去几年中，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似乎由于《京都议定书》批准与实施过程中的曲折而有所减弱，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显然正在呈现为一种十分不同的境况。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而来的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渐提升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显与尖锐化——最具国际影响的最新实例当然是 2005 年底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全方位与深层次地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时代要求，而这无疑使得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生态环境问题探讨有着迅速膨胀的成长空间，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政治学。^[1]

环境政治（生态政治或“绿色政治”），从理论层面上说，意指人类如何构建它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其中包括人类与地球及其生命存在形式的关系和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践层面上说，涵指人类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某种类型环境问题或对环境问题某一层面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及其政治应对。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将环境政治（绿色政治）划分为内容上密切关联的三个部分：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色政党政治或政策）和按照政治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2]

在笔者看来,环境政治的上述划分依然是基本正确的或有效的。因为,它不仅明确体现了创建一个“生态社会”或“可持续社会”的绿色政治主旨,而且符合或遵循了从认知/利益基础到公众动员再到制度性变革的传统政治分析逻辑。换句话说,尽管它清楚地意识到传统政治框架几乎必然会带来的生态政治理念的温和化,但也相信:现存民主政治体制将会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构架的自我更新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议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传统政治的绿化”,而环境运动组织和绿党将成为环境政策与管制制度创设与革新的政治性工具手段,或者说“绿色变革代理人”。作为侧证,著名的《环境政治学》杂志在其办刊宗旨中强调,它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3]可以看出,这与笔者对环境政治的上述界定大致相近。

当然,上述划分或笔者当时思考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的国内政治视角——即相信任何接受某种形式生态主义的民主国家将会有着相近的环境政治实践,而相对忽视了环境政治在理应具有的国际、跨国或全球向度下比较分析的重要性。部分作为其结果,这种视角下的环境政治界定难以有效解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间的环境政治现实发展差异和这些相对异质性政治主体在国际性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追求“环境全球管制”制度架构时存在着的严重歧见。因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间在围绕生态环境议题上的政策观点、现实利益和回应手段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肯定会对它们的环境政治理念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从方法论上说,本书所做的重要补充与扩展就是试图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国际比较来完善对环境政治的概念性理解与设定,或者说将环境政治视为一种国际政治。^[4]也就是说,环境政治不仅是一个



以民族国家为核心政治舞台而展开的不同政治角色解读、消化和回应生态环境议题的新型政治现象（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之内的区域与地区性环境政治），还是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主体在国际、跨国或全球层面上就生态环境议题展开的既冲突又合作的非传统政治过程。

从环境政治的国际或全球视角看，自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到 2002 年约翰内斯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人类社会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挑战的历程已经历了 30 多年的时间。一方面，我们在观念更新、政策工具创制和制度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进展。无论其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将世界上各不相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并做出了一系列政治承诺，从而清楚地展现了一个政治理念所可能拥有的力量；德国绿党 1998 年大选之初提出的“每公升汽油提价 5 马克”的竞选主张曾经吓跑了很多的潜在支持者，但仅仅几年之后石油价格的飞涨已经让大部分理性消费者意识到更高油价或更严厉生态政策手段的必要性；除了日趋复杂的环境法律体系和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成立一个更加强权的世界环境组织（WEO）正在成为国际共识，等等。简言之，我们正在生活在一个日益“泛生态化”和环境国际化规制的世界里。从国家安全、民族生存，到个人衣食住行，我们已经很难“自由地”选择或无所顾忌地行动，环境关切及其国际化制度与规则已成为一种必须的考量。就此而言，环境政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和制度内的存在，与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并无必然关联。另一方面，人类生态环境迄今取得的改善显然不能让人满意，而且国际社会的相关努力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或矛盾。^[5]从 1970 年到 2000 年，能源消费这一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食品消费、淡水使用、整体经济活动和人口总量等世界性人类环境影响指标，

都大致翻了一番。但是,更让人忧虑的还是严重制约着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共同性应对效能的深层次问题或矛盾。概括地说,这些问题或矛盾包括: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视角与利益聚合困境”。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现实利益需求,往往使它们对同样的生态理念、政策工具和制度架构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传承与经济政治现实的差异或者难以弥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或者会增添新的环境难题(对于部分迅速工业化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是生态化国际制度创新的“合法代理人困境”。在国内政治层面上,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被普遍认为是绿色变革的政治先导或“催化剂”。^[5]但是,即使假定他们的绿色信念与意志不会因为对传统政治渠道的不断介入而发生蜕化,这种少数群体的政治参与如何能够带来社会整体的绿色变革仍然是一个难题。而在国际政治层面上,基于环境运动团体与绿党国际化拓展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最多只是处在萌芽阶段。三是生态理念国际制度化的“有效机制困境”。无疑,民族国家政治、国际政府间谈判、区域一体化机构比如欧洲联盟、联合国机制比如人类环境大会,都在生态理念的国际制度化过程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但《京都议定书》签署与实施过程中的遭遇和要求组建一个世界环境组织的呼吁所清楚表明的是,我们离一个有效的国际或跨国制度化机制显然还有很长距离。

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状况总体恶化与经济社会外在依附性相并行的事实不难理解,但发达国家所提供的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方式连接却难免让人困惑: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与应有尽有的大众化物质消费,另一方面是日趋严厉的环境技术与法规标准和不断改进的生态环境状况。^[6]如今,即使仅仅参观过欧美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公众感慨最多的恐怕也首先是它碧水蓝天的生态环境,然后才是其舒适方便的物质生活。的确,碧波荡漾的英格兰乡村、风景如画的莱茵河

谷地、一望无际的美国西部原野、林荫交错的当代欧洲都市，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经验性事实。因而，一个很容易得出的联想或结论就是，基于现代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自身蕴涵着对所有生态环境难题的最终解答。换言之，所有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提升将是人类最好的环境政治，而忠实地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模式将是最为切实有效的战略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从生态环境自身还是从传统政治的视角看，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提升都最多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尽管这并不排斥少数有能力和机会开展卓有成效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会迈入相对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日益扩展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事实上也在提供着这方面的现实性机遇。那么，对于尤其是那些依然致力于现代化进程却已明显地面临着诸多后现代挑战包括生态环境难题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而言，西方国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绿色变革的真实意蕴究竟应如何解读？各种绿色政治角色推动下的“传统政治的绿化”和经济社会的生态化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相应地，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立场来借鉴欧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政治应对经验并参与国际或超国家层面上的环境管治框架构建？尝试性地回答或探讨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概括地说，本书将致力于阐明：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就像它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换言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因而并非是普遍性的范本。这绝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甚或贬低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成功经验，而是说，对于一个迅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来说，环境政治的现实发展理应有着自己的特色，而这首先基于我们理解国际环境政治现实、自身应承担的责



任和所追求未来的一种新境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令人信服地回答西方国家对崛起中中国的环境关切：我们并非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也在努力提供着对这一人类共同难题的解答。^[7]

从结构上说，本书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与环境全球管治、和欧美绿党政治。正文十四章分别来自笔者近年来所发表的专题性论文，并在此做了部分观点修正、补充和完善或技术性调整。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可持续发展：生态主义向度”（《文史哲》1998年第3期，第110～116页）、“欧洲绿党与环境团体的关系：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比较”（《文史哲》2000年第6期，第115～120页）、“80年代末以来的西欧新社会运动”（《欧洲》2001年第6期，第84～92页）、“80年代末以来的西欧环境运动：一种定量分析”（《欧洲》2002年第6期，第75～84页）、“西方生态主义视角下的儒学‘生态学’”（《文史哲》2003年第6期，第115～120页）、“公众环境政治参与：公民社会视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2期，第45～52页）、“国际环境安全观：现实困境与理论思路”（《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第17～22页）、“欧洲执政绿党：政治与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5～117页）、“美国绿党政治：以麻州绿党为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第73～83页）、“北欧绿党与欧洲一体化：以瑞典和芬兰绿党为例”（《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67～80页）、“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90～98页）、“Massachusetts Greens in electoral politics”（*Environmental Politics* 15/4 [2006], pp. 650-655）、“绿党的欧洲化与欧洲民主”（《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第80～103页）、“环境公民权理论与绿色变革”（《文史哲》2007年第1期，第157～163页）、“环境全球

管治与东亚区域环境合作”(《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7年,即将发表)。^[8]在此,笔者谨向首发这些论文的国内外期刊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集中讨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广泛的几个生态政治理论流派,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安全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环境公民权理论。如果将现代生态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的演进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生存主义理论”阶段、“可持续发展理论”阶段和“生态现代化理论”(或生态现实主义)阶段,那么,这些生态政治理论流派大致属于其发展的第三或第二个阶段。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们都可以概括为在传统政治学视角下吸纳生态主义价值理念的理论努力。笔者并不认为这其中的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甚至其简单化综合可以提供人类当代生态环境难题应对的灵验处方,但可以肯定的是,仅仅着眼于复活民族文化传统——无论其本身如何博大精深——比如“儒学生态学”的努力不可能带来对复杂化现代社会现实的真实超越。

在第二部分中,笔者主要讨论了与生态政治理论相对应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实践的第一个侧面即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和环境全球管治。欧盟国家的实例分析表明,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的确担当着创建一个促进现代文明绿色变革的社会基础或“绿色公民社会”的功能,尽管这一功能的发挥似乎正在逐渐采取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形式和更加建设性的方式,而不再主要体现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样的大规模社会抗议。但是,我们依然应十分谨慎地声称已存在着一种世界性的环境运动或是依此为基础的“全球环境公民社会”或环境全球管治。西方标准的制度化环境组织或团体显然难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社会动员的常态性模式,而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国际或跨国环境管治主要是在区域一体化或合作组织的范围内展开的,既没有简